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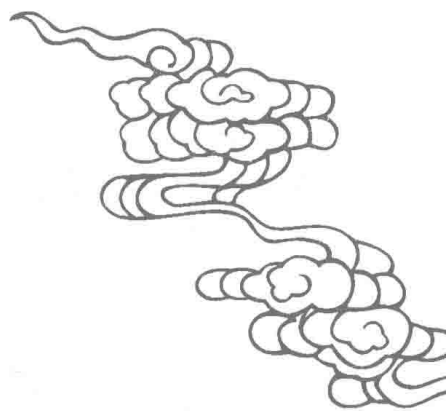
牟宗三文集

牟宗三

名家与荀子

主编 吴兴文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牟宗三文集 ▲

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出版说明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存亡续绝而奔走呼号。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被看做过时和不时髦的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延至当下，或者稍早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复兴走向了误区，诉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思考的价值。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有趣的是，国人的研究领域也如同时尚界，凡思想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也是它即将过时的时候。这造成了我们对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思考略知皮毛而已。想牟宗三先生也难免此一规律，且因为种种原因，牟宗三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吉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牟宗三文集》。在此过程中，幸而获得台湾“学生书局”等出版界同人

的支持，促使此一计划得以成行。

这套《牟宗三文集》我们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哲学的特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人文讲习录》《政道与治道》《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共计十三种，其中《圆善论》等五部作品为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出于对牟宗三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由于牟宗三先生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有一定差异，所以我们并不赞成牟宗三先生在某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方面的表述，尽管如此，凡属学术讨论范畴领域的内容，我们除作了个别修改外，尽量均予以保留，以不伤害作品完整性为第一原则。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够采取拿来主义观点，借鉴吸收其有益的建设性的部分。

编者

导 言

近二三十年来，两岸的人文学者在交流切磋的学术活动中，秉持存异求同的态度，逐渐取得多方面的共识，正可作为今后的“异地同心，分工合作”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与讲论，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也最能畅发儒家义理的旨趣和时代使命。《牟宗三先生全集》已在他逝世八周年时，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三十二册，另有总序与详目合成的附册，以为导引和查考。由于全集各册不能零售，而多数读者又无力购买全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鉴于此，乃与台北“学生书局”接洽，辑印一套简体字的《牟宗三文集》，计汇集原由“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先生重要著作十三种。其中通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内蕴与前景者，皆详确而精当；而探索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者，尤其明通而条达。好学之士循而读之，必可日起有功，大有进益。

依笔者的体认，牟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可以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一）表述心性义理——使儒道佛三教的智能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如：《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便是分别讲论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宋明理学的专著。经过深透的疏导解析，再上通于先秦儒道二家的原始典型，则中国哲学的系统骨干、义理纲脉及其思想演进发展之关节，便朗然而明白了。

（二）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如：《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书，便可代表牟先生的新外王学。传统的仁政王道、民本民贵，何以未能开出民主政体？经典中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教训，又何以出不来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世纪困惑，从来没有人能提供通盘的解答。而牟先生则作了彻底的大反省，他提出的“三统并建”，即（1）民族文化生命立本的问题（道统的光大）；（2）建立民主体制的问题（政统的继续，开出政道）；（3）发展科学知识的问题（学统的开出，所谓良知自我之坎陷，即是对此而发）。牟先生提供的是新外王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而分门别类的具体工作，则是士人与公民都必须担负的共同责任。

（三）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如：《中国哲学十九讲》，书中所讲，不是一时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关中国哲学之系统纲格与义理宗趣之综述。书中厘清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之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牟先生能完成这样通盘兼顾的哲学大工程，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上的大事，从一个哲学家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也是古今罕见的。而相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源流系别、开合发展，与重智一系之分疏等等之问题，在他书中也做了深广详审的探讨。（笔者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便主要是依循牟先生开显的纲脉而写成。）

（四）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本文集虽未编入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却采编了牟先生消化康德与融摄康德的专著，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持续十年之久。他随时比对，随时查核，几乎每字每句皆细加考虑，一定要达于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他译注康德书所表现的精诚审识，实已重现了晋唐高僧翻译佛经的风范。他不但译，还作注，有时一条注文便长达两三千言。译注之外，他还另撰专著，来消化融摄康德。这样的学术精诚，也是古今中外鲜见其比的。

（五）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如：《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一部通盘考虑中西哲学会通的书。如所周知，中国儒道佛三教都讲生命的学问，和西方知性文化中的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中西哲学对“感触界”（现象界）与“智思界”（本体界）之或重或轻，或消极或积极，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关键所在。牟先生借取佛教“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相当于康德之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之感触界），而指出中西哲学皆是开二门。但二门孰重孰轻，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则彼此有所不同。顺此而涉及的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牟先生都已作了层层之比对和深入之疏解。

除了上述五点，而尤为可贵的是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在四十、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可说年年在进步、时时开新机，他所开显的思想家的型范，是极为罕见的。

总之一句话，牟先生的著作，无论深度、广度、高度、纯度，都是第一等的。读者细心循读，必可有得。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之。

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谨述
己丑（2009）十二月于台中市椰风北轩

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 和哲学创造

——序《牟宗三文集》

一、小引：题说

吉林出版集团筹划的《牟宗三文集》即将印行之届，电邀我写一篇序。电话中，我告诉联系的编辑，（关于）牟先生的事，在我，是第一位。故虽恰逢忙头，仍乐于允命。此“序”，当对了解牟先生提供一个总体观始能相应。唯距印行的时间极为急促，只能勉力而为。

牟先生八十大寿时尝云：他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之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牟先生亦尝手书示我：“吾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时年，牟老师八十五岁。越二年，牟先生逝。我寝馈牟学三十年，尚可言有感受，又经反复慎思，自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这句话确可以概括牟先生的一生努力和贡献，亦未曾失上揭牟先生自我概括之意蕴。唯此“典范”和“创造”是在历时弥久的反儒反传统中，在中国文化和儒学大厦被倾倒毁弃中，在牟先生判之为中华民族“最倒霉的时代”、国族历史“大患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大危疑的时代”，“争剥以复”成就的，故而有“创业垂统”的意义。唯其是“创造”，故而是“创业”；唯其是“典范”，故而能“垂统”。乃以“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敬以为题，序吉林版《牟宗三文集》。

二、从圣贤之乡走出来的大哲学家

牟先生是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当代新儒家大宗师。但我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牟先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哲学家，而这亦将透显出他的“学思”与“生命”的意义，透显出他的学思生命之发展是个无穷的奋斗。

孔门以“博学以文”为训，又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当是牟先生“学思”生命的义涵。如同孔子吾十五有志于学云云，牟先生亦有个凸显“学思”对生命成长意义的生命发展观，以“学思”为分程杆竿将吾人生命划为“学思”前后两大程。他自述他的学思前生命是在混沌中成长的自然生命，其中虽无学问以及通过学问而凸显的形式真理，但却有性情，亦有光彩。而学是自然生命之一曲，学思生命是自然生命通过学之一曲的发展。从混沌的自然生命放射出来的一道一道的清光，每道都在曲折的间接发展中。牟先生说，那些清光之曲折的发展也决定他的学的生活所注意的领域与境界，以及其路线途径与形态。（《五十自述》，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年1月，第18页）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发展观，还另有其深刻的哲学义蕴，兹不论，我要说的是，牟先生的自述亦在说明，学思前的自然生命对于学思生命非无意义。大约一些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早年生活对其思想都有或多或少的构成性，都有早年意识元素。当代新儒家巨子如此，牟先生亦然。这可能已可认定为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刘述先先生于1983年，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梁漱溟“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编为《生命的奋进》（《百姓》半月刊出版）的缘故。

牟先生是一个农家子弟，逊清宣统元年己酉四月十五日（1909年6月12日）生于山东栖霞牟家疃。山东是孔孟圣贤之乡。栖霞则道家全真教邱处机大宗师的家乡，山川灵秀，村落疏朗，邱道长说过“走遍天下，不如我小小栖霞”。牟先生的《五十自述》留引了这句话。牟家疃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乡村。从牟先生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的牟家疃，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扫墓、过节，演戏酬神，

贴合着人情人性，不失人伦教化之正，顺适谐和而根深蒂固，民风淳厚朴质，“安其居，乐其俗”，日用而不知地保存着儒家礼俗中道。牟家是个“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但也是世代耕读相续的传统家族。牟先生之父，名荫清，刚毅守正，有令誉于乡里。常读曾文正公家书，至晚又常讽诵古文，牟先生常旁听，“心中随之极为清净纯洁”。父亲以“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有坚定的义理信念的人”、儒家“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一直留在牟先生的记忆和生活中。父亲的写字“整齐不拘”后来也成为牟先生的一个终身良习。乡村的礼俗气氛，少年的牟先生感觉颇有情味，舒畅亲和，感觉与自己的生命有自然的契合，生命在其自己；祭礼中更感着生命通着祖宗、神明，有通着思古幽情的愉悦；自戏娱中，也有着独立自足的形构之兴趣，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之内在情趣，又表现出强度的直觉力；与旷野相处，升起苍茫寥廓感、落寞而不落寞得浑然感。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考入北京大学，牟先生才结束了这样的村居生活。

礼失而求诸野。清末民初的村野人伦礼俗文化，去古未远，正是社会学意义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它不仅保存着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更是后者的源头活水。（余英时台北版《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之《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未收入南京版同名书，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12月，第134页。）“安土敦乎仁。”牟先生与村野礼俗文化的契合，养成的喜欢最直接的生命与人格的生命格调和情味，他心中所亲切喜悦的是与土接近的农民，喜欢与苍茫寥廓接近的荒村野店的赶马者，这表明传统文化及其义理教训在牟先生的生命中是生了根的。至于通向祖宗、神明的思古幽情以及种种情趣、能力、感觉，以及在《说还乡》一文所表达的强烈的存在感受，则都表示出哲学的天赋与哲学的潜质。那些混沌的感觉，是原始的哲学意境，经过反省、凝聚、提炼，就会贞定为对现实政治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感、超越感与宇宙情怀，而铸造真实的学思生命和哲学风格。牟先生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即“最直接的人格”的真人，他自己就明确说过，他少年时代对圣贤的“嘉言懿行”如陆象山的话头、朱子治家格言之

很有兴趣，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个“读哲学的头脑”（樊克伟整理《学思·译著——牟宗三先生访谈录》，台北，《鹅湖》，1992年12月）。

新文化运动后的民初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是脱了节的。那时北京的气氛，据牟先生所观感，是“绝对的粗犷的唯物论所促成的放纵恣肆”的“大浪漫精神”。牟先生因为“青年”，因为“混沌”，“也沾染了那泛滥浪漫的精神”，也为吴稚晖“漆黑一团的宇宙观”所吸引。但有根的生命终归要内转回归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唯其中国文化的义理教训在生命中生了根，所以牟先生在被沾染的同时即觉察“八字驳杂”的国民党党人的唯物论观念和“纯是经济决定的”阶级意识，抹去了中国流行几千年的人品人格的观念，是“外在的非人观念来在农民身上妄生分别”，而迅速从左倾浪漫中撤退；继在父亲斥时代风气的棒喝下，思想和生命“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从他父亲身上，他亲切地觉得这时代的浅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是无坚定的生根的义理信念，只是浮薄的投机取巧，来践踏斫丧民族的生命。认为这就是思想观念极端泛滥浪漫制造的“新式的人祸”。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牟先生的“客观的悲情”，激发他一生致力守本、疏本、立本——返本开新的疏通中国文化生命的哲学创造。

哲学的天赋、哲学的潜质和读哲学的头脑在学思生命中是一定会开发起用的。唯其如此，牟先生从时风土习中超拔，生命当下归其自己，即收摄精神，并能很快进入哲学工作，自力翻译怀悌海（Whitehead，1861—1947）的《自然知识之原则》与《自然之概念》（译稿留存家乡，1949年后毁）；自学治《易》，至大学三年级完成《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四百页大著（1988年台北重版更名《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其著虽为牟先生自视为不成熟的少作，但它却在中国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彰显了另一羲和的“智学的传统”，显示了极高的哲学天分，而获李证刚、林宰平等师辈的赞许，张东荪称“唯有牟君这样的研究古籍始足为‘哲学的’”。他更接上儒学在当代的学脉，为当代新儒家哲学开山大师熊十力所赏识。熊先

生尝言“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牟先生谓从熊先生对时风士习的狮子吼中，始见“能通华族慧命而不隔”的“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由是开出回到“存在的领域”而契悟关于生命（个人的与民族）的学问之向上一机。从此，师生慧命相续几十年，使当代新儒家困顿履渐，发扬光大。

至此，我可以指出，牟先生从乡村走出来的特殊意义。“安土敦乎仁”，是牟先生的生命底子，亦是他学思生命的本根。他是带着生命的本根，带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和源头活水，带着哲学的天赋、哲学的潜质和读哲学的头脑走出来的，或者说，他是作为中国文化和儒学的种子走出来的。这将决定他一生坚持孔子的立场，走孔子的路线。他对他的学生们说：“我忠于我的所信，一直贯彻下去。我走的是孔子的路，我的立场是纯粹哲学的立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立场。我和唐（君毅）先生都是这个立场，就是孔子的立场。”（《先秦儒学大义（七）》，《鹅湖》2007年11月）牟先生是天造地就的哲学家，是天造地就的大儒。

三、典范的学思生命

自入北大每天到图书馆读《朱子语类》，学思生命七十年。牟先生是哲学和儒学大师，这“大师”不是由于当今时代慷慨赠予的名，它是实，是三十余部印行的著述、译著、讲演录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堆砌夯实的。这三十余部，还有未入编台版《牟宗三先生全集》的十种哲学讲演录，思想深邃了明，文化义蕴丰富，即使是文集所收亦无不是文化意识贯串流溢的睿智碎金，皆牟先生动心忍性、长途跋涉的学思结晶。它展现了牟先生学思生命和牟宗三哲学的大悲情、大智慧、大气象、大格局和典范意义。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和牟宗三哲学一体存在。亦可分别说，非分别说。此一体存在，完成了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儒学的当代典范之创造。分别说则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展现出开放、担当、独立的形态或说研究形态，这是即存在即超越的形态，也是品格，

构成其时代典范的学思生命。

牟先生的学思，其领域是广大的，其心态是开放的，面向宇宙，面向历史，面向时代。面向宇宙而信而有《大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宇宙情怀，指出各归其位建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是人类的文化建设与文化问题。面向历史而不论反省中国文化还是疏导西方哲学必从观照历史开始，从头疏解华族文化生命、学术命脉。而最后落实到面向时代，而揭抉近现代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症结和时代病，此症结即人类精神之量化、外在化以至量化的极端化。唯此亦激发牟先生自述一生“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时代与感受·序言》），对时代唤醒人之价值意识、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

这三个面向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哲学处理与文化处理三个结合的学思路数与特点。本内圣之根据以开外王的思想总纲，其基本理路即集中表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自大学时代潜读罗素、怀悌海哲学起，凡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牟先生皆有论述与深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他消化西哲的一个结晶。牟宗三哲学思想体系亦是他由分判而会通中西哲学的硕果，以致台北辅仁大学校长罗光（罗马教廷台北区大主教）教授以“企图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来评述牟先生的学思历程，牟先生认为文化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时代问题归到核心即是哲学问题。并具体地视“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五十自述·序》），落实到现实的哲学工作上，即是指导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所以哲学处理与文化处理的结合，深一层说，在牟先生是哲学智慧与文化意识的合一。在对学生说他的哲学立场和哲学工作时，他即明确说：“在这个时代，你后面是还要有一种文化意识做你的动力。……你就是读纯粹哲学，后面也要有文化意识。”

这三个面向和三个结合，实在是前贤往圣“十字打开”的心灵，是“圣之时也”的孔子路线。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牟先生尝诠释儒家性命天道贯通哲学，是将天道神性收进来，通出去，所展示的是一个完全打开的文化心灵，并明确提出“儒耶合作”一观念，指出

此“可使天人关系的道理圆融通透”。这个诠释与观念，集中而无可置疑地展示了牟先生的哲学心灵是敞开的，向宇宙人生、古今中外的敞开。

牟先生极赞同他的挚友唐君毅先生的一个重要观念，这就是：“人自觉地要有担负。”牟先生悲心观照时代，从个人的存在感受而悲怀苍生，悲怀家国天下历史文化的大患难遭遇。他对这个大患难有大感受、大忧患、大担当。依牟先生之见，担当的精神是道德性、理想性的，是人、是儒者当有的道德实践，是孔子所豁显的儒家真精神。牟先生的担当，是以他全幅生命，以他悲智双运的学思，承当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活转圣贤的学问与人类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儒家遭四国之战中，“以生命顶上去”！“以生命顶上去”，表现了牟先生担当精神的凝重、刚毅、艰难，豁显了其担当的存在性，是“存在的担当”，亦是“义理的担当”。这个从“存在的感受”到“存在的担当”，是牟先生学思生命所展示的基本的生命形态与学问品格：它也厘定了当代儒者以及处于大患难时代的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生命形态与学问品格。而牟先生集大感受、大忧患、大担当于一身，也就是一大悲、大智、大勇统一的生命，则不仅是当代也是任何时代读书人的人格典范。

尤有时代意义的是，树立了独立不倚的研究形态。研究形态与生命形态直接关连。在牟先生，研究形态与生命形态完全统一。牟先生的生命形态和研究形态是外绝声华、独立不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无傍依。用唐君毅先生的话说，是特立独行。唐先生以特立独行著称，但是，牟先生比他还特立独行。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尤其表现在与现实政治权势的关系上。牟先生向来藐视权贵，外绝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痛恨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势纠缠在一起，学问与现实政治混杂在一起。我看到一则材料，说还在人文友会时期，有学者演讲《大学》时引用孙中山、蒋介石的言论，牟先生竟当众予以痛斥，一点情面都不留。现实政治权势是从外面来的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最大威慑，一旦与其纠缠在一起，你的独立性就会保不住。牟先生将独立性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在《时代与感受》

一书里，他强调学术王国的独立性，是教育学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如果学术不能在现实政治面前坚持独立性，那么就只能做清客、帮闲。牟先生还极明确地说过：“我不是站在任何现实的集团、现实的利益上”，“我的依据不是现实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国家，华族的文化生命。”牟先生“是站在价值之源生命之源的精神实体之肯定上”（第116、122页）来学思肯否的。牟先生的独立形态即此透出超越意义。就此可见，牟先生的学思生命是壁立千仞的人格生命。

这个独立、超越的形态，可以由牟先生《哲学智慧的开发》（收入《生命的学问》）得到意义诠释。其中讲哲学研究三种预先必备的心境，也是三种哲学的气质：一是要有汉子气，二是要有逸气，三是要有“原始的宇宙悲怀”。这三种心境，也就是勇、智、仁。遮拨地说，就是要你对一切富贵名利都不在意，把心思从外面的牵连中收回来，从一切外在的套套粘缚中超拔出来，从冻结的现实中超拔出来，从物欲习气中超拔出来。牟先生说，若你终不能有这种心境、这种气质，你即不能有哲学活动。

其实这三种哲学活动预先必备的心境、哲学的气质，是牟先生夫子自道；即对学术研究所需的独立形态而言，也是个内在的说明、哲学的说明与阐发。独立的研究形态是哲学智慧开发的要求，是哲学活动、一切学术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学术研究如何从现实政治的笼罩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中国人过去在科举套套中解决得不好。现代政治的笼罩力更大，问题的严重性有过之无不及。这里，牟先生学思生命的示范意义显而易见。他的独立不倚，他对独立性的见解，他对哲学智慧的开发，即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解答。

四、开创儒家型的哲学诠释学

成就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儒学典范创造的，还包含着一套方法论的贡献。牟先生实际提出了一套具有现代诠释学意义的方法。它有四个要点：①客观了解，②根据文献，③扣紧问题，④生命进路。表现出